关 注 Vision

“朋友圈”里的大学师生关系

新媒体是搭了桥还是横了墙

●朋友圈里看上去热热闹闹和和气气的师生关系背后，缺乏内在的、精神上的信任和尊敬

●面对面的深入交流，可以有观点的争论，甚至还会碰撞出许多火花

●现在老师发表文章或观点，好像学生不去转发微博、朋友圈里点个赞就不够尊敬

关掉朋友圈、取消手机微信提醒功能，曾强把微信好好清理了一番。

曾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，转发了一篇题为《逃离“朋友圈”》的文章，他配上了文中的一句话：社交媒体充满魔力，但这种魔力也可能产生反作用力，演变成为一种困扰。

在曾强眼里，对和他一样的高校教师而言，社交媒体的“魔力”在于它给传统师生关系搭了座“桥”：学生不再抱怨老师“到点上课，下课走人”，师生间的交流沟通多了条线上渠道；课堂上的案例资料、课堂外的延展阅读，老师可以随时随地对教学进行补充；学生还能了解到老师更立体的形象，朋友化的师生关系显得十分融洽。

可让这位就职于西部某高校的年轻教师没想到的是，“魔力”也给他添了堵“墙”：朋友圈里私人化、生活化的文字或图片分享被学生截屏晒到更开放的网络平台上“吐槽”；每天用来备课和科研的时间被学生的问题和“问候”粉碎掉；花费大量时间筛选推荐的文章，学生大多是点赞但不看……

让曾强下定决心“逃离”朋友圈的，更是出于心里的担忧——朋友圈里看上去热热闹闹和和气气的、像朋友一样的师生关系背后，缺少更深入的学术讨论和交流，缺乏内在的、精神上的信任和尊敬。而这，在曾强看来，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最重要的基础。

社交媒体变身第二课堂，老师形象更加立体

如今的大学校园里，老师和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成为“好友”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，线上渠道成为课堂的一部分。用曾强的话来形容，“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棒的第二课堂，或者说延伸课堂”。

曾强所教授的《广告学》课程上经常会涉及案例分析和讨论，但由于课时有限，以往这些案例都只是在大屏幕上匆匆一过。当微信班级群建起来后，曾强便可以将这些重要的案例随课堂进程分享给学生。不仅如此，作业反馈也可以单独和学生线上沟通，不占用课堂时间，“教学可以不受限制，随时随地进行了”。

“老师的许多推荐阅读，能很快加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，还能跟上专业领域的热点。”曾强的学生王丽说，以前听说大学老师都是上完课拍屁股走人，但现在许多老师都会有微博、微信账号，课下的互动会让学生对老师更加亲近，不那么陌生了。

和曾强一样，吉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潘晓婷也是个在新媒体上“活跃”的老师。在她的朋友圈里，不仅有上课案例、热点文章的分享，还有自己的读书笔记和心得，她常常还会晒晒喜欢的音乐、生活中的趣事。

“一方面学生对于这些补充知识可以偶得，另一方面师长的‘神秘性’也没有了，关系融洽，仿佛他们就像是弟弟妹妹或者朋友一样。”潘晓婷说，现在的学生都是95后、00后，他们对老师权威性的认同度已经不像从前的学生那么高了。“虽然学习靠自觉，但和学生建立了朋友关系后，通过日常的交流，如果喜欢我，他们也会喜欢上我传授的知识。”

在河南某二本学院的教师李晓菁看来，在社交媒体上的老师会更加“立体”，因为这些媒体上，老师不仅会推荐专业性的文章，呈现自己的思考和观点，而且也会展现自己生活化的一面，这种立体的、较为全面的形象和人格魅力会拉近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，让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、学术思想的碰撞有更多的可能，“这样，师生关系才能延续得更长远，而不会仅仅只存在大学4年”。

朋友化的平等交往更需要精神上的尊重

然而，这种“朋友化”的师生关系也会带来一些困扰。

有一次课间休息，曾强发现，班里一个请了病假的同学，竟在朋友圈里晒出正在海边旅行的照片。考虑到私自出游的安全问题，曾强给了这个同学旷课处理，并在微信里让他赶紧向学校报备出行信息。

曾强没想到的是，这位旷课的学生竟然拉黑了自己，还在微博上吐槽“老师卧底微信跟踪学生”。

不仅如此，曾强还发现，有的学生会一边给朋友圈里老师的分享点赞，另一边把老师分享文章时简短的观点表达截屏发到微博上议论，甚至把老师晒出的旅行照、美食照挂到贴吧里，说老师“炫耀”……

于是，曾强意识到，“社交媒体都是浅层次的交流，缺乏精神上的沟通和信任，所以对这种朋友化的关系还是应该有所界定”。

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徐伟就给自己的微信一个明确定位：只限于浅层次的话题交流，比较有深度的学术讨论需要采用线下的方式。在他看来，较深入的学术问题在新媒体上的简化表达会造成误解和偏差。因此，他依然会保持每个学期组织四五次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会。

紧跟新媒体潮流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红在博客、微博、微信上都有账号，她一直保持和学生在线上的互动，通过新媒体平台传道解惑。

在王红眼里，线上的交流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，但也应该“公私分明”：不过多发私人相关的信息，不披露自己的隐私也不涉及他人的隐私。“作为一个师者、长者，发言要慎重一点，可以表达观点，但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。”她认为，文字形式的简短表达，容易被误解、放大。

“其实，朋友圈里，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是师生关系，难免会有角色冲突的时候。面对面的深入交流，可以有观点的争论，甚至还会碰撞出许多火花。但线上交流有时容易情绪化，随性随感的东西较多。”李晓菁很赞同师生之间建立平等交往的朋友关系，但她也认为，有时候这种融洽浮于表面，没有扎实的信任基础。

“所以，我觉得面对面的、深入的交流沟通是不可缺少的。传统的交流方式会让师生之间产生更多精神层次的理解和信任，更能赢得学生的尊敬。”李晓菁说。

师生关系不能靠点赞维持

从开设博客“长亭短亭”到现在已有10年，王红博客上关于学业、工作、生活等问题的讨论非常受学生欢迎，她也陆续使用微博、人人网、微信等工具“紧随潮流”与学生保持零距离。

然而，她最喜欢、最怀念的，是连电话都没有的时代。“那时候学生问问题，没有电话、手机，就在老师破烂的宿舍里，坐在床边或者随便拿张报纸坐在地上就聊开了。我觉得那是师生关系最融洽、最美好的状态。”王红说。

随着博客、微博、微信的介入，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。王红认为，新媒体虽然快捷、方便，师生交流从表面上看也非常活跃、比原来热烈，但慢悠悠的、较为深入的交流越来越少，或者说只能在小范围的学生中进行，“恐怕大家都是网上匆匆而过，急急忙忙打个招呼而已”。

“其实我想说不合时宜的话，这种关系可以稍微降一点温。现在老师发表文章或观点，好像学生不去转发微博、朋友圈里点个赞就不够尊敬。我觉得还是稍微沉淀一下比较好，师生关系不是靠点赞来维持的。”王红说。

“人际交往过频其实未必有利于关系建设，可能适得其反。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刘津认为，“老师对社交媒体的投入不可能是无限的。如今对一个人而言，比较困难的恰恰是保持自我，而不在社交中迷失。要留给自己自我更新的空间，才能给学生更有价值的东西。”

此外，刘津提到，刚当老师时，她特别信任自己对于学生价值观和人格塑造的力量，所以在交流上投入大量时间。现在，越来越感觉老师不应对自己的影响力过度自恋，个人的眼界和智识受制于自己生长的时代和环境，随着这两种因素的变迁，个人的见识对后辈的指导价值也会减小，所以，在与学生的社交上，也更加节制了。现在更多是在学生主动求助时给出个人的看法，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去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，作出自己的选择，顺应自己的意愿。

“我想，‘逃离’朋友圈是希望渐渐回归到较为冷静、理性的师生关系，不要把时间碎片化并消耗在社交媒体的热闹之中，更多地通过面对面或者邮件等形式增加学术上的讨论和交流。作为老师，我们要自律，学生也要自控，‘朋友圈’让老师和学生成了朋友，但融洽的师生关系不能总靠‘朋友圈’。”曾强说。 中 青

（应访者要求，曾强、王丽、李晓菁均为化名。）

域 外 Vision

日本人为啥不愿“生二胎”

日本政府鼓励生育遇难题

（本报资料图片）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近年来，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正不断进行着较大的调整。在我国的东邻日本，面对长期困扰和制约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的低生育率问题，政府和民间都进行着积极而深入的思考和尝试。日本《产经新闻》日前刊发长篇稿件，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剖析，其中不乏可资借鉴之处。

该文章指出，日本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正处于加速恶化的过程中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，去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。与此同时，体现每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的“总和生育率”指标在去年也出现了时隔9年后的再次下降。

对此，该文章分析指出，由于在日本，未婚产子的女性人数较少，因此采取为年轻人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、提供相互结识和交往的时间和场所等鼓励婚姻的措施，对于“头胎”的出生都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。

然而，如果每个家庭仅养育一个孩子却无法使日本走出低生育问题的阴影。如果“二胎”乃至“三胎”的数量得不到明显增加，日本人口数量自然减少的趋势将不可能出现逆转。然而，对比往年数据来分析其中的构成比例就会发现，去年“二胎”的减少趋势十分明显，在下降的出生人口构成中比例高达55.94%。分别是2013年的5倍和2012年的12倍。而如果没有“二胎”，“三胎”显然也无从谈起。

在日本一个名为“‘多生一个’支援团”的组织所进行的“夫妻生育意识调查”中，有高达八成的受访者回答称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子女数量为“两个以上”。

但与此同时，有75%的受访者对于生育两个及更多的孩子，都感到了一种令人苦恼的“二胎纠结”。在这些深深为“二胎纠结”而感到苦恼和彷徨的受访者中，有86.5%的人都提及“经济方面的原因”，有64.7%的职业女性表示是“工作原因”导致其对于生育“二胎”感到犹豫。

与此相对应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“21世纪成年人纵断调查”的统计数据表明，一个家庭中，丈夫在休息日投入到家务和育儿中的时间与“二胎”子女的出生比例呈明显的正相关性。

如果丈夫在休息日投入到家务和育儿的时间不足2小时，这样的家庭“二胎及以上”子女的出生比例仅为31%，但如果超过6小时以上，则对应的比例将迅速提升至76.5%。

对此，该文章分析认为，要想消除“二胎纠结”，日本社会习以为常的“长时间工作”必须得到改变。

在日本企业，有许多人由于基本工资较低，因而不得不靠加班费来补贴家用。因此，要改变“长时间工作”的风气，并不能简单缩短工作时间，而是必须建立并普及一套“以工作绩效而非工作时间”来评价员工的体系。

另外，如果希望减少“二胎纠结”，解决“休产假难”的问题也已刻不容缓。目前，在日本社会，随着“夫妻双职工”式家庭结构的普及，在“头胎”出生时休产假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。但是，当休完“头胎”的产假后，再申请“二胎”的产假，则会让许多人感到内疚和不安。不少人都担忧，如果老是休产假，就将不会被委以重任，或者被剥夺重要的职务。

对此能够加以佐证的是，在“夫妻生育意识调查”中，如果职场的上司对于产假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，则对于生育“二胎”不感到纠结的人数比例将提高近10个百分点。因此，职场的“生育氛围”如何，对于能否打破“二胎纠结”将起到关键性作用。

此外，该文章还指出，随着晚婚晚育现象的普遍化，妇女生育更多子女在生理上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谢宗睿

史 话 Vision

悔教夫婿觅封侯

这阵子还有什么比股市更让广大人民牵肠挂肚的吗？唔，是高考成绩公布了。

分数公布，有人欢喜有人忧，股市赚得再多，孩子没考好，那个满足感也是要打折扣的。当然，如果孩子考得好，股市也赚得多，那简直就是人生大赢家了，简直就要对着苍天长啸了——夫复何求？

望子成龙，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，炽烈而执着，折腾不休。但相对于望子成龙，还有一种更持久与更折腾的，名叫“望夫成龙”。

一

“望夫成龙”的典型，是东周列国时期百里奚的老婆杜氏——她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，这也正是“望夫成龙”中妻子命运的真实写照。

这个故事很曲折：百里奚家很穷，30多岁才娶上老婆，那个年代，绝对是晚婚典范了。结婚了，做爸爸了，百里奚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也想出去谋份差事，但还是觉得家里好啊，老婆孩子热炕头啊。但杜氏很坚决，让老公早点出去打拼。她说：男儿志在四方，你不要整天待在家里，难道老了再出去创业？家里的事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呢！

百里奚是个男人，听了这话，哪还在家里待得住？第二天就要开始闯天下了，出门前，杜氏杀了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，发现没有柴火，就把门闩劈了当柴火烧了，让百里奚饱餐一顿出门了。丈夫出门，妻子照例有吩咐。杜氏告诉百里奚的是：日后富贵了，可别忘了我和孩子。这就是许多年后陈胜吴广的名言了：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。

富贵难求，百里奚的闯荡之路异常艰辛，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，做过牛倌，甚至还当过乞丐，一直没混出个名堂来，也没好意思回家，那时没手机也没高铁，慢慢地他与家里失去了联系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百里奚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回了趟家，但杜氏母子已不知去向。他继续在外面折腾，最惨的时候，做了奴隶，给人放牛。

到了77岁，他才时来运转——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买回了百里奚，让他当了秦国的相国——可见那时干部提拔制度真是大胆创新。他就像在泥沼中挣扎求生的虫子，突然飞龙在天了。

这个励志大片最终有一个令人欷歔但温暖的结局：某一天，相国大人大宴宾客，并有歌舞助兴，酒正酣时，有个老妇人唱起了歌：“百里奚。五羊皮。忆别时。烹伏雌。炊扈豦。今日富贵忘我为。”百里奚酒全醒了，走近一看，天哪，真的是杜氏！两人相拥而泣。距离上次离别，已足足有40年。

今天看来，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。丈夫的功名，真的就有那么重要吗？值得一个女人牺牲40年？或许在漫长的离别中，他俩都后悔过，想回到起点，只是被命运戏弄，哭着，跪着，也要走完自己选择的路。

二

给这个残酷故事稍添温暖的，是百里奚最终还是认了这个老妻。类似故事最多的结局，是望夫成龙的妻子，眼睁睁看着丈夫成了龙，然后找了只凤，远走高飞，过高大上的神仙日子去了，再也不看一眼留在原地含辛茹苦而又满心期待的糟糠妻子，譬如代表着劳动人民道德批判的陈世美秦香莲故事。

唐人王昌龄有诗云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说的是一个正当妙龄的少妇，一心想当“一品诰命夫人”，在春天某个日子，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登楼消遣，不经意看到杨柳已返青，瞬间就生出彻骨的摆脱不了的孤独来，开始强烈地思念丈夫，渴望丈夫此刻正陪在身边，共享这春光，共度这春宵。

有人恶搞过古诗，说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适合放在任何一句七言古诗后，最有笑场效果。“悔教夫婿觅封侯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在很多时候，成了“望夫成龙”励志剧的剧透：丈夫在成龙过程中，成了出墙红杏，成了花花色龙。

周星驰和吴君如主演过一部电影《望夫成龙》，讲一对乡下青年男女相爱，但女方家长不愿意那穷苦的孤儿当女婿，于是这对青年逃婚到城里来，新婚之夜，她把象牙筷子留给他，自己用便宜的木筷，他过意不去，她却说：“以后你是一家之主，贵的东西，都该你用。”为了丈夫能出人头地，妻子全身心奉献，舞女、清洁工……什么活都干。丈夫渐渐发达了，进入了主流社会，却对自己的妻子不再有爱意了：他发现，女人和女人，城里的有文化有见识的女人，与乡下女人，有那么大的区别。

这几乎是“望夫成龙”的女人之宿命：妻子留在原地，苦苦支撑丈夫往上爬，但丈夫爬上去后，发现与妻子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。

《望夫成龙》的结局是不太真实的皆大欢喜：妻子离家出走后，丈夫突然良心发现，幡然悔悟，保持单身，而妻子则周游世界，自我修炼，噌噌噌地提高了综合素质，然后某一天，两人不约而同故地重游，破镜重圆，幸福地在一起了。

这部电影的潜台词是：女人不但要把丈夫培养成龙，也要想办法把自己整成凤。如果他成龙了你还是条虫，他嗖地就飞入云端，你却只能蠕动着身躯，艰难地抬起头，看着龙尾一摆，仙踪难寻。

三

对于女人来说，这是极不公平的一道选择题：A.他成龙，我也成凤；B.他成龙，我还是虫；C.他是虫，我也是虫；D.他成龙，把虫子带成凤。选“A”难度太大，选“B”风险太大，选“C”又不甘心，很多人只能一厢情愿地选择“D”。很少有女人想到，其实还有一个选项：E.他是虫，而我成了凤。

许仙与白娘子，其实就是“E”的组合：美丽贤惠又神通广大的白娘子，偏偏爱上了怯懦无能却又多疑偏听的许仙，为他赴汤蹈火，为他九死一生，为他不顾一切。她不要求许仙成龙成仙，只希望他简单地爱她，过着尘世间夫妻最平凡的生活，她宁愿佯装成虫。

其实，即使是白娘子这样的女强人，在夫妻关系中，也是处于一个奉献者的地位。或者说，她的角色对于许仙，“母性”更大于“妻性”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，中国女人母性强而妻性缺。一针见血。

有话说，“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”，历史与现实中一个个“望夫成龙”的故事，却似乎印证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妻子是丈夫最好的老师。”《烈女传》里记载的乐羊子妻（又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人），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：乐羊子在外读书求功名，有一次想老婆了，回家来，结果不是“小别胜新婚”，老婆没有惊喜地扑到他怀里，压根就没跟他温存，而是板起脸来，给他上了一堂思想政治课，为加强说服效果，还掏出刀来，把快要织好的布匹，一刀劈为两半，告诫老公：“不要半途而废！”

可怜的乐羊子……他灰头土脸地又出门寻师求学了。估计他欲念全消，边走边想：这是我老婆吗？这简直就是我娘，不，比我娘还狠……

《红楼梦》中，薛宝钗的判词写的是“可叹停机德”，用的就是乐羊子妻的典故——妻子停下织机，教育了丈夫一顿。宝玉爱的是黛玉，恬淡纯真，但最后他娶了宝钗，宝钗跟乐羊子妻走的是同一路线，不时劝宝玉投身仕途经济，而宝玉却“不求上进”，甚至将“读书上进的人”取名“禄蠹”，可想他在宝钗的絮叨之下，有多么痛苦，又多么怀念那位香消玉殒的未能做成他妻子的林妹妹。

四

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写过一个有趣的情节，说方鸿渐刚混了个假博士文凭回上海时，到张先生家里去相亲，对张小姐没啥感觉，倒是打麻将赢了钱，有说有笑，“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，他瞧沙发旁一个小书架，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……一本小蓝书，背上金字标题道：《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》(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)。鸿渐忍不住抽出一翻，只见一节道：‘对男人该温柔甜蜜，才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好印象。女孩子们，别忘了脸上常带光明的笑容。’看到这里，这笑容从书上移到鸿渐脸上了……抬头忽见张小姐注意自己，忙把书放好，收敛笑容。”

张先生、张太太后来都给了方鸿渐差评，张小姐更是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，予以痛骂。而方鸿渐在回家路上，“想起那书名，不禁失笑。丈夫是女人的职业，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，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。哼！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，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，骂我饭桶……”

《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》这本书，无疑泄露了张小姐的隐秘心理，相反让方鸿渐拥有了心理优势，所以前者恼羞成怒，后者乐不可支。

如何守住丈夫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，尤其是丈夫成龙之后。电视剧《蜗居》中有句著名台词：“他好比一个西瓜，我给他浇水施肥，西瓜成熟了，却被小三给吃了。”所有“望夫成龙”的妻子，其实都有这种胜利果实被别人盗取的恐惧。但守住丈夫，仅靠张小姐的通俗读物中所言“温柔甜蜜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，这是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社会中对男人的并无太多约束力的道德约束，相伴之的是糟糠之妻频频被抛弃的现实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一个庞大的苦难妻子形象：她们在丈夫未发达之前，万般辛苦供丈夫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丈夫出门赶考，一走几年，她们独自承担家庭生活重任，服侍公婆，抚养儿女，辛劳难以言表。但是丈夫发达之后，便将她们遗弃，如同抛弃穿旧的鞋子，丝毫不见昔日情义。戏曲无穷无尽地演绎着这些故事，赚足了人们的眼泪和骂声，包青天的虎头铡一出，那自然是四海欢腾。

有人分析说，无论是夫妻关系中的“母性”，还是苦难妻子形象，传递的都是一个信号：丈夫要“知恩”，要“报恩”，发达之后即使看不上因辛劳而过早衰老的妻子，但也要给原配妻子一个位置，这才是夫妻伦理之“正道”。

以贤良换取爱情——这是中国古代妇女在爱情上的一个心理误区，以为早期付出越多，未来就有更多的保障。但这不是爱情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多少有才华的女子，多少雄心勃勃的女子，多少才智都不亚于男子的女子，却无法在正常渠道施展才华，她们不能参加科举，不能从军，不能出仕。她们所有的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，只能寄托在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身上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因为万恶的旧社会。现在大不一样了。

五

1918年，农历正月十五，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。他的日本籍夫人诚子闻讯赶来，百般努力，与他见了最后一面。诚子叫：“叔同。”他答：“请叫我弘一”。诚子问：“弘一法师，请告诉我什么是爱？”他答道：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
这是另一种夫妻的告别。他不觅功名，了却尘缘，避世而去。在今天，这个社会大流动的时代，几乎每天都有夫妻告别，梦想沉沉浮浮，欲望浓浓淡淡。世上有很多类型的夫妻，有一种叫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无数夫妻不愿这样，要鱼跃龙门，要飞龙在天。

在失去中收获，在收获中失去。这是一代人的精神煎熬。新疆作家刘亮程写过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文字朴拙而悠远，其中写自己独自进城努力想把家搬到城市，某一天晚上，他回到久别的家中，“在这间卧室，这张铺满月光的床上，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，我的妻子在等我的时候独自睡着。谁会懂得，她一个晚上荒掉的，是我一生都收不回来的，无法补偿的。那些荒睡的夜晚将永远寂寞地空在她的一生里，空在我充满内疚的心中，成为我一个人的荒凉。”

他的文字，一个一个打动人心：“我宁让土地荒弃十年，也不愿我心爱的妻子荒睡一晚。”因为，人无法忍受人的荒芜。

人在荒芜，人心也在荒芜。但又能指责什么？悔教夫婿觅封侯？人生能有几回搏？还是描写弘一法师故事的电影《一轮明月》中有句台词好，那是印光法师对弘一法师说的四个字：“要惜福呀！” 关山远